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续）

阅读

高等教育

基于女性主义
认识论的视角

王珺 著

在：知识与性别：的视角下，：威严的：高等教育第一次呈现出其拒女子于门外的面目。这张已经世俗化的面孔并未放下它端了千年的架子，它依然显示着男性的刚毅与威严，无处不在地表现着对女性的不屑与冷漠。：另类阅读：开启了一个文化改造过程的序幕，知识的男性权威形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天津人民出版社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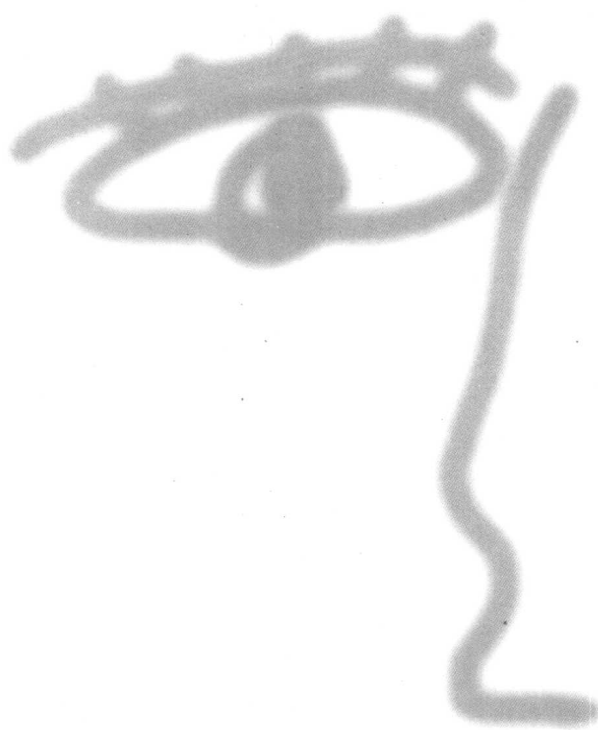
阅读

高等教育

基于女性主义
认识论的视角

王珺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阅读高等教育：基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视角/王珺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续)

ISBN 978-7-201-05349-3

I. 阅... II. 王... III. 高等教育—性别差异—研究 IV. 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99540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46

网址：[http:// www. tjrm. com. cn](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 tpt. tj. cn](mailto: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210千字 印数：1-3,000

定 价：23.00 元

总 序

妇女学的兴起是人类认识和知识革命的重大事件,这一方兴未艾的新兴学术正在席卷全球,锐不可当,因为她顺应时代的进步潮流和学术、教育发展趋势——在知识领域,她从社会性别的维度切入,对人类知识进行全面的检视、反思和重建;在社会领域,她旨在消除性别歧视而又关注阶级、种族、民族、族裔、地区、年龄等一切不平等、不公正问题;在天人关系方面,她具有社会人文关怀而又注意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和可持续性关系……她的宏伟目标和宗旨决定了该学科领域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特点、合作的工作模式和多重敏感批判视角在实践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内地妇女学学科建设曾有过短暂的繁荣,但很快被现实妇女问题研究和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的发展项目所湮没。重提妇女学学科建设是在20世纪末,一个转折标志是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由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牵头的“发展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联合课题(2000年1月—2006年8月)率先获得支持。本课题的四个子课题分别为: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基础”、既有原来的学科边界又有多学科和跨学科潜力的“社会性别与历史学”、“社会性别与社会学”和“社会性别与教育学”。六年来,每个子课题开展了翻译引进、梳理本土研究成果、读书研讨、师资培训、编写教材、开设课程试点和进行教学法的探讨等一系列的学科建设的基

础工作,同时整理并在内部印行过一系列的专辑。为了满足妇女学快速发展的需要,为了使更多同行能分享资源和经验,本课题组最近将逐步推出“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由于四个子课题组的相对独立性,其成果将分别结集由数家出版社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包括了课题共创共享的《社会性别》系列出版物(共4册)、“社会性别基础”子课题(共3册)和“社会性别与历史”子课题(共3册)等成果共11种(其中《当妇女提问时》一书为教育学子课题成果)。该书系以学术的前沿性和治学的严谨性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对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得益于妇女学学者的全心投入、真诚合作和硕果累累的国际妇女学的惠泽。参与本课题工作的有内地数十所大学的妇女学学者(有的是妇女研究中心的成员),先后参与课题活动的学者和研究生约有数百名,港澳台同胞的支持分享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国外的合作者遍布欧美、亚洲,其中,美国的密西根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数所分校)、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罗格斯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的妇女学同行(有的是旅美、加同胞)的合作交流,不但使我们获得了全球妇女学视角,而且带来了非常及时的学术信息和研究理论方法的参照。在这里,让我们以沉痛的心情缅怀工作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鲍晓兰博士,她对中国妇女学和妇女史学科投入了15年的热忱和心智,不幸于2005年底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在亚洲近邻,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亚洲妇女学中心主持的亚洲妇女学课题,直接推动了区域妇女学发展,课题成员在参与亚洲妇女学的密切合作中对本土的探索更为自觉。与港台地区同行的交流分享,在没有语言障碍而有同根同文的交流之便条件下,内地的妇女学获益更多。

该书系的出版,不但是国内外妇女学者协作努力的结果,也得益于出版社慧眼独具抓住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内开妇女与社会性别学风气之先,实在值得称道,也必将在出版史和学术史以及教育史上留下佳话、印记。而福特基金会对课题的支持,更是该书系顺利出版的物质保证。在此,作为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和书系的主编,我对所有贡

献于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合作者、支持者表示敬意和谢忱!

既然是课题,总是有时限的。尽管“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于2006年8月结束,但妇女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使命并没有终结。我们将继续把“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续)”做下去,诚盼海内外妇女学学人加盟,惠赐佳作;也期待国内外有识之士为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学术精品著述慷慨襄助!

杜芳琴

2006年8月

序

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也十分繁荣。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比其他教育系统更需要同各个方面交流信息,开展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社会性别(gender)分析已成为一个与阶级、种族相并列的、不可或缺的分析范畴。而在我们这个以男女平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在学术主流中(包括高等教育研究中)却鲜见以性别作为分析范畴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由于种种原因,女性的成长、成功要比男性艰难得多。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最初都是为男子所设并将女子拒于门外的。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社会价值体系基本上基于男性中心,父权制话语造就的意识根深蒂固,这种状况的改变不可能仅通过政治改造就能完成,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文化改造过程。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依然先入为主地影响着人们对女性能力的评价、业绩的褒贬和作用的评估。例如,在“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夫贵妻荣”、“贤妻良母”等等观念的影响下,男性取得成功后,很容易得到社会的支持和普遍赞扬,自身也会产生自我成就感;而女性的追求与成功则可能带来诸多不理解,冷言冷语,甚至影响到个人的家庭生活。再者,由于生理上的差异,女性在生儿育女、家庭生活等方面都比

男性付出更多,牺牲更大。这一切与教育有关或无关的现象,我们的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都很少关注,针对教育中性别差异、性别歧视的论述也相当贫乏和肤浅。现代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科学”话语的操纵下,也都采取了一种性别盲视的立场。王璐在这个方面做了尝试,她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借鉴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理论视角,对高等教育做了一个全新的也可以说是相当“另类”的解读。

在教育科学中,关于知识的研究是多学科共同努力的方向。教育哲学、课程研究、教学论等都无法回避知识的问题,王璐在研究中以“知识与性别”为主要线索,通过分析高等教育中的四个核心概念(高深学问、学科、课程、教学),批判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基于男性中心的传统解释,重新审读高等教育和有关高等教育的“科学”话语,破译了高等教育自身所蕴涵的性别符码,提出了女性/女性气质与高深学问的悖论是高等教育性别歧视的知识论根源,质疑了学科价值中立的立场,分析了课程所蕴涵的性别意识形态,反思了大学教学中的权力问题。通过这样的解读,揭示了高等教育中性别歧视的认识论(知识论)根源,完成了由法律、社会层面解释性别歧视向精神、知识生产层面关注性别歧视的转换,为高等教育中性别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和解决策略。这一学术成果为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是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有益尝试。

作为王璐博士生时期的导师,我为她这本学术专著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王璐有比较扎实的人文素养和理论基础,又经过了多年的教学实践,通过攻读高等教育学的博士学位,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都有了进一步提高。本论著涉及的课题关涉多个学科、多个方面,而且有些是人们争议颇多的问题,王璐知难而上,以科学的态度,刻苦的精神,朴实的作风,扎扎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她查阅了大量文献,走访了国内多位在女性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并深入到女教师、女大学生中进行调查、研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了专家的肯定和一致好评。

在我国,教育、高等教育中的性别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王璐

所做的仅是一个开头,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我很愿意将这本有个性的学术专著推荐给大家,同时也希望这部专著的出版能够激发作者进一步的研究热情,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成绩。

刘献君

2006年3月于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目 录

001 导 言 对高等教育的“另类”解读

001 女性主义与高等教育

009 文献分析

018 研究的角度、框架与方法

022 第一章 女性·知识·话语

023 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学术

034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内涵及其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

048 重建的策略: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构想

065 第二章 高等教育与女性的疏离

066 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存在状态

078 男权文化的解释方式

083 女性主义的解释方式

099 第三章 高深学问与性别

100 社会性别制度

111 女性与高深学问的悖论

123 经典文本的性别解读:卢梭的《爱弥尔》

第四章 学科与性别	132
学科制度及其性别立场	132
女性主义对学科的反思与重构	144
第五章 课程与性别	155
作为性别文本的课程	156
女性主义对课程文化的认识论批判	165
妇女学与大学课程改革	170
第六章 教学与性别	194
传统教学论与性别	195
女性主义教学论与大学教学改革	203
结 语:在路上	218
参考文献	223
后 记	234

导 言

对高等教育的“另类”解读

女性主义与高等教育

女性问题/性别问题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关注的国际政治性课题,它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中,性别因素也逐渐成为研究社会现象和行为不可或缺的解释性变量,“经常同阶级、种族、族裔、性倾向等分析人类社会等级制的范畴并列使用”^①。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性别偏见与性别歧视是普遍的、久远的,也是国际性的。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露丝·海霍(Ruth Hayho)比较了中国与西方高等教育传统之后,曾指出:“尽管在历史上,双方的大学几乎没有彼此影响,但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代初期(约12世纪)妇女都被完全排斥在大学之外。”^②19世纪中叶之后,世界各国才陆续以各种形式向女性开放了高等教育系统。从表面上看,目前,男女虽已有平等入学的法律与制度保障,接受公共教育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但事实上,这种形式上的机会均等并不能保证高等教育渠道的性别公平,在机会和资源的享有上,在教育过程中的发展期待以及发展结果上,女性依然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微妙的性别偏见的围墙仍然继

续制造着迥然不同的教育环境,引导着女性与男性走向分离与不平等的未来”^③。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解释,主流学术界和教育界要么采取漠视的态度,并不将其纳入问题的视阈加以特别关注,更谈不上成为重要的研究关怀;要么视这一切的不平等为自然合理的,“几乎所有教育学以及与教育相关的学科都在‘合理’地淡化和消解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都在‘科学’地把性别不平等解释为自然的‘性别差异’”^④。直至今日,著名的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先生还在公开场合宣称“在一些领域,女性缺乏天赋能力”,男女之间的先天差异可能是女性在理工科鲜有建树的原因。^⑤对此,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率先提出了质疑,她们从女性主义的认识立场出发,用独特的社会性别视角批判了传统学校教育中有关知识、学科、课程和教学的基本理念,并对传统教育中的权力内涵以及体现着控制关系的权力概念的局限性进行了重新认识,以“另类”的方式诠释了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歧视问题。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女性与男性在本体论上是完全相同的,即他(她)们拥有一样的灵魂与理智,女性之所以受歧视,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与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和受到批判思维方面的训练。^⑥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解决高等教育中性别不平等的方法就是平等地对待男性与女性,包括入学权利的平等、资源分配的平等,等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第二次西方女性主义浪潮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这一时期,女性主义的关注点已不再局限于高等教育中的“妇女问题”和对“性别歧视”的批判,而是强调女性在历史中、在研究中和高等教育中的主体身份,希望赋予父权制结构下被剥夺权利的女性以话语权和影响力,并赋予那些非客观性、非等级性或权利附属性的知识以合法性(这些“知识”往往与女性的经验和感受密切相关)。在此,女性的身份也由传统学术研究中“关于妇女的研究”(study of woman)中的客体地位变成了“妇女学”(women's studies)^⑦中的主体地位。套用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论述女性主义科学的话来说,在教育研究中,这一过程实际上也经历着由“教育中的妇女问题”到“女性主义中的教育问题”的转变;^⑧研究的对象也深

人到了对认识论层次上性别与知识关系的探讨。在对高等教育的重新审读中,女性主义学者从知识的角度发现:高等教育的主题与女性经验和生活经历无关,是性别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她们从一门门学科开始,逐步对整个知识系统进行清理,发现高等教育所标榜的“价值中立”的知识立场和传统教学内容的“真理性”、“权威性”和“客观性”都需要质疑。事实上,所有关于高等教育的认识与建构无不呈现出性别化特征并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不是像学术权威所声称的:知识是公正、客观、价值中立的。从女性主义的认识立场来看,高等教育的这种性别化特征与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歧视是可以形成因果解释或进行互释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孤立的“性别问题”,而是一个特别复杂且相互关联的“教育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甚至是一个深刻的“认识论”问题。显然,女性主义对高等教育的审视已触及到了有关高等教育的“元认识”,在女性主义看来,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偏见与高等教育所蕴涵的性别化特征密切相关,而这种性别化特征又深藏于它所依据的传统认识论(或知识论)基础之中。

本论著认为,以女性主义认识论为理论手段,通过对性别与知识关系的解析,可以透视出高等教育中性别歧视的认识论根源。因为高等教育中有关高深学问的观念、建构主体、建构原则、建构逻辑、论述主题和研究方法,学科的意识形态,课程知识,教学原则、教学知识的传授过程等在女性主义视野里无不打上了社会性别的烙印,女性主义认识论正是破译这一性别符码的有效工具,它为重新解读高等教育奠定了可选择的、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为我们移开了高等教育的性别屏蔽,为认识 and 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与西方国家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其独特性。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东西方女性都有长期被高等教育排斥的历史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和发展结果上面临的性别不公正问题。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使得人们在关注与解释这一问题时,呈现出与西方女性主义不同的认识路径。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长期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建国后

的前 30 年,“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反映了国家意志的性别意识形态,这种由国家意志强制推行的平等理念和模式,确实也起到了改变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作用。在这种状况下,高等教育中出现的性别问题或被掩盖、或被“淡而化之”,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重要的学术关怀。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由国家意识形态所构造的性别平等神话在市场意识形态的冲击下逐渐幻灭,在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中,在我们每天所面临的生活实践中,性别歧视在内容有所变化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公开、更加普遍,同时也更加“正常化”。“男女平等”的文化观念逐渐幻化为一种抽象的政治符号,大量性别问题的凸现曾一度引起国内女性问题研究的热潮。由此,高等教育中出现的性别问题也开始受到学术关注。90 年代中期以前,国内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理论工具,在“地位高低”论的框架内进行阐释,并由此产生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女性主义学术思潮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随着研究者们对女性主义认识 and 理解的深入,他(她)们也开始尝试用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性别问题。

但是,时至今日,在中国的语境中,女性主义(或称女权主义)始终是一个备受误解的概念。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形象往往很容易被描摹成狂热的、咄咄逼人的、极度自我张扬且缺乏“女人味”的;在学术界,一种相对普遍的误读就是将女性主义仅仅视为一种性别政治立场,甚至简单地等同于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它不配与“尊贵”的学术研究相提并论。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界引进了多种西方学术思想,创建了许多新兴学科,但女性主义这个在西方学术领域已占据重要位置的思潮并未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关注。国内虽然一度借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热潮,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也曾热闹喧嚣一时,颇引人注目,但那也仅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圈内人的交流与自我言说,还远未成为一种公认的基本文化视角。相比于国内学界对其他西方时尚理论的追逐与热情,

学术主流对女性主义长期保持着一份冷漠与不参与的矜持。

尽管这份冷漠与矜持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但是,在如今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中,作为研究者,我们已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从根本上区别于人类有史以来由男权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所滋生的哲学观与方法论,对思想、文化、社会、学术(人文社会科学)已产生了广泛的话语渗透与深刻影响,妇女学/社会性别学(或称女性/社会性别研究)已在学术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发展成具有专业水准的、对当代西方社会批判性最强的一门跨学科学术。事实上,当代女性主义关注的议题早已超越了政治层面的意义,突破了早期纯粹以女性抗争为本的理论探索,论证的重点也由女性的权益转向关注两性差异以及两性权利的互动。女性主义借鉴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挑战西方以男性为中心、以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理论的霸权方面,已毫无异议地成为西方思想资源的一部分,并为当代反主流文化和知识论述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叙述方式”。它在解构深层社会意识、思维习惯、文化符码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其在声势强劲的后现代思潮中已居于一个核心位置。特别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对解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菲勒斯逻格斯中心(Phallogocentrism)^⑨二元对立机制所作的探讨和努力,更加凸显了女性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开创性、前瞻性风采。伊格尔顿(Eagleton)在总结后现代理论带来的可取之处时,就特别强调女性主义关于性别政治的理论在解释历史与现实社会中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在重新思考‘现代性’的问题时,将不可避免地以女性主义为认识基础。”^⑩

事实上,国内有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或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如何生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将把人类历史归结为性别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另外一种历史,而是一种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

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煞的东西。”^⑩但是,对女性主义有这种认识的研究者在国内并不普遍。无论是大众话语还是主流学术依然对女性主义存在诸多误解,对女性主义的关注,也似乎仅局限于“女人”的范畴和女学者的圈子,“在‘后妇女解放’的中国,跟妇女和性别有关的问题,在当下(男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中,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基本上少有提及。至于‘女性主义’为何物,与知识分子有何关联,就更大在大多数现有思考的视野之外”^⑪。在此,笔者也并不想深入探究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与女性主义疏离的复杂原因,只是关注与本论著有关的中国女性研究者对待女性主义这种理论资源的态度与立场问题。

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后,面对着这一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资源,国内的女性研究者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从未放弃过的对其“本土化”的诉求。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实际上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她们既希望通过女性主义的理论来反观当下中国国内的性别政治和女性地位及其变化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另一方面,她们同时又要抵制或者反抗一种以西方为准则的权利关系。这一状况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女性研究者的特定心态——她们既期望得益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同时又不被这些理论背后的西方霸权结构所制约。”^⑫所以,在中国的语境中,对于女性主义这个“舶来品”的理解,如果我们不找到自己的立场,总会有“隔着纱窗看晓雾”的隔膜之感。实际上,当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再次进入中国的时候,^⑬国内一些学者在肯定女性主义所提出的性别解放理论的终极合理性的基础上,曾就其使用单一的社会性别分析范畴而忽视阶级、种族等其他分析范畴提出过质疑和挑战。^⑭几乎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性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同样的挑战,这一挑战已引起了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广泛反思,其反思中心是超越白人中产阶级的阶级局限,开始转向对女性研究更广阔丰富的社会内涵的解读。她们发现,在不同的文化里,性别歧视主义并不是女性生活中唯一的压迫力量,而是时常与阶级、种族、结构性的贫困、帝国主义等复杂因素缠绕在一起共同起作用。事实上,正是由于女性主义的这种